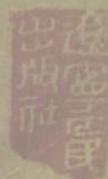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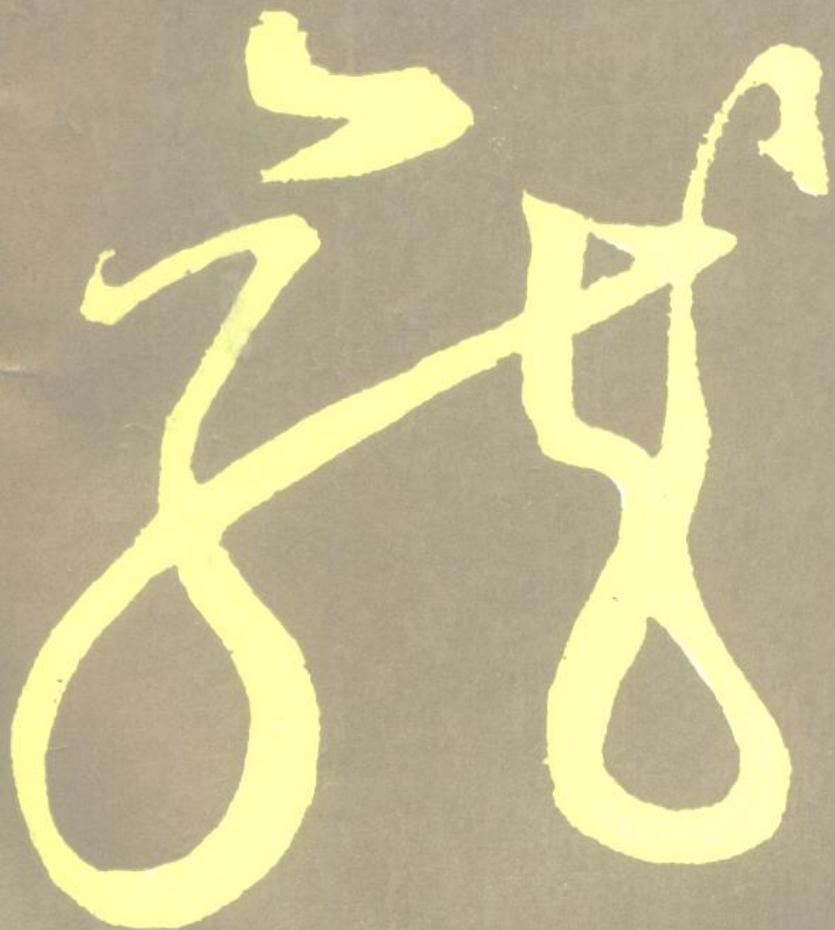


中國社會

——原型与演化

陈建远主编



中 國 社 會

——原型与演化

陈建远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

中国社会
——原型与演化

Zhong guo She hui

陈建远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

字数: 340,000 开本: 850×1168mm 印张: 14% 插页: 3
印数: 1—3,043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关丽 插图: 杨丽珠

封面设计: 李国盛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曹颖

ISBN 7-205-00555-8/D·117

定 价: 5.35 元

DAS9/10

目 录

绪 论 1

第 1 章 中华民族 33

文明的摇篮 34
华夏族和民族融合 41
民族性格特性 46

第 2 章 中国传统家庭 65

从群婚制到一夫一妻制 66
婚姻关系 75
亲属体系 82
家庭的社会功能 89
家庭类型的演变 97

第 3 章 传统经济结构 107

小农经济的形成 108
传统经济结构 120
传统经济与传统社会 127

第 4 章 社会政治结构 137

阶级的分化 138
权力的组合 161
传统政治的功能 186

第 5 章 传统宗教 205

宗教意识的形成 206
冲突与交融 211
作用与归宿 228

目 录

第6章 传统哲学	243
传统哲学之演变.....	245
传统哲学之表征.....	265
传统哲学之精神.....	270
第7章 传统艺术	283
艺术精神的确立.....	284
艺术形式的演变.....	295
传统艺术的一般特征.....	309
第8章 导向社会主义	319
盛极而至衰.....	320
西方浪潮的冲击.....	330
从麻醉到觉醒.....	341
变革方向和结果.....	351
第9章 改革之路	359
摸着石头过河.....	365
“比基尼与牛仔”.....	382
“85新空间”.....	395
真理、人、哲学改革.....	401
民主政治的潮流.....	423
第10章 二十一世纪展望	431
迎接新的挑战.....	432
腾飞的前奏.....	442
心灵的动荡.....	452
中国与世界.....	459
后记	472



· 絮论 ·

(一)

8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热潮。在文学领域，作家们首先注目于文化踪迹的描述，于是有了“寻根文学”的勃兴。韩少功的“楚文化”探索、王安忆的“俗文化”和“纯文化”刻画、郑万隆的“外来文化”和“民族文化”别论、李杭育的“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比较、贾平凹的“秦汉文化”寻觅，以及张洁的“儒文化心态”追踪，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观念的重要变迁。文学的寻根浪潮亦波及影视、音乐、绘画和舞蹈等艺术领域，艺术家们通过昂歌“龙的传人”、描述神话题材和追求古朴之风，刻意于探索民族精神的真谛，展示传统观念与现代精神的搏击。在文艺思潮影响下，哲学界展开了对传统文化本质的大讨论，从而将寻根热潮推向高峰。

对此，人们难免会产生一种疑问：为什么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向全面改革之际，会出现这样一种文化现象。解答这一问题，不仅需要从中国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寻找根由，而且有必要将目光拓阔到整个人类世界。

15世纪欧洲社会的剧烈变革，曾导致古希腊文化的复兴热潮；而随着西方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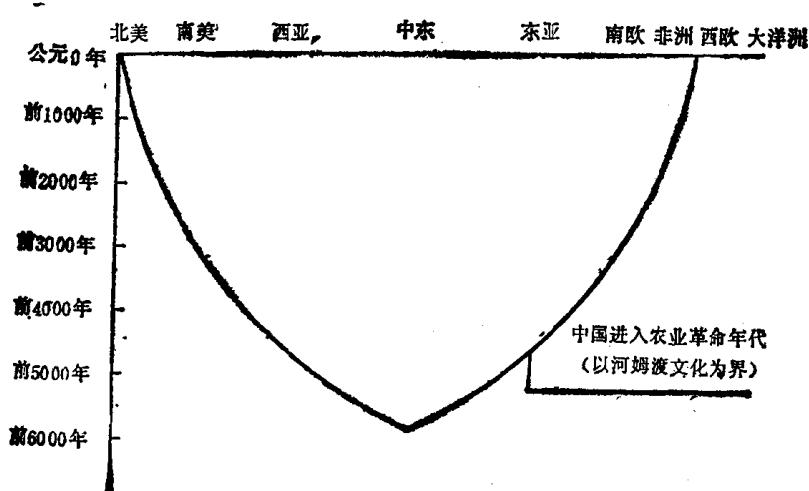
化的全面完成和社会发展速度的递进增长，20世纪西方思想界涌现了更为持久高涨的文化复兴热潮。在社会科学领域，历史学对文明社会的起源研究不断深入；考古学、神话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迅猛发展，则打开了通向史前社会的神秘之门；更有甚者，诸多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以其对猿猴社会的考察和生物基因的考察（社会生物学），来展示人类与自然的原始联结点。这可以说是一场世界范围的寻根风潮。由此，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带有普遍意义的定律：人类对未来生活之开拓与对自身历史之追溯的程度进展之间，有一个正比关系。这一定律显示了，在历史发展中人类自觉性的不断增强。人类对历史的尊重，正是为了希望制约历史的发展。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旨在全面清除旧社会的痕迹，牢固确立无产阶级新社会的基础。要完成如此伟大的革命运动，必须正确对待民族的传统文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必将同传统的文化精神、民族心理和社会结构相抵牾，但改革又绝非意味文化发展的截然断裂。为此，在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之际，如何进而光大民族精神，这真正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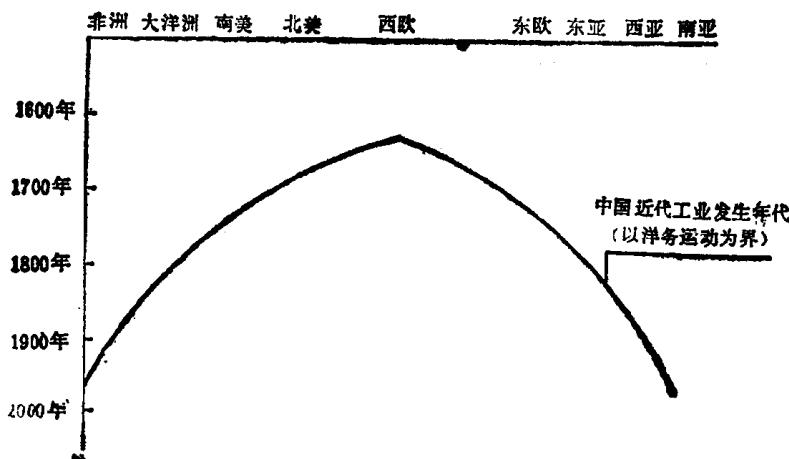
人类实践的基本形式，无非是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当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虽然以发展生产力为基本目标，但其实质乃在于改造社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所需改造的对象却了解甚少。与自然知识相比，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科学认识简直微乎其微。如果一个医生在治疗病人时，对他的病情所知甚少，那么这样的治疗必将是盲目的，甚至会带来危险。在此，我们无意于否认业已积累的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和哲学史方面的丰富学识，但是，从服务于社会全面改革的意义来看，这些专题知识未免显得过于零散。人类社会是作为一个整

体而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运动的最大特点在于高度的有机性，因此，对社会知识的专题把握，只有在把握社会总体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充分显示它的价值。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不仅是指它拥有世界的五分之一人口，更主要的是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灿烂的古代



古代世界农业革命发生年代图示



近代世界工业革命发生年代图示

文明，这些文明成果曾给予世界历史发展以重要影响。中国社会的庞大构成，使其形成自己特有的缓慢、稳定的进化运动，这恰如物理运动中质量与惯性的正比对应。当近代世界发生剧烈变革之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便明显地落伍于世界，巨大的惯性质量使它产生了一种抵消外力推动的惰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显得异常艰难。然而，社会历史的发展毕竟要优于自然物体的运动。历史是人创造的。一旦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使历史发展摆脱自发性，那么就会聚生一种强大的动能，届时，中国社会进步将呈现新的加速递进趋势。

半个世纪以前，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深入展开之时，毛泽东曾写下《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伟大著作，其中第一章便是“中国社会”。通过对中国社会基本特点的分析，他完整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以此为民主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同样是在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比革命年代更为复杂，为此就需要更加严格的科学态度作指导。全面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将为实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宏愿，提供切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编写《中国社会》一书的意图，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书写作可视作中国当代思想界寻根热潮的发展结果，但它力图从科学高度来开辟新的寻根起点；

第二，通过全面描述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为当前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提供参考；

第三，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是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只要我们能够确立一条充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事业就具有无比光辉的前景。

(二)

方向既定，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所用方法。我们该怎样来认识中国社会的本质呢？

从一定程度上说，由中国人来写中国社会，要比外国人写中国社会更为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作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缺乏必要的视角距离。对此，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曾有一个通俗的比喻：“有一个法国人到了英国，在居住三个星期后，便打算写一本关于英国的书，但是在住了三个月之后，他发现还缺乏充分准备，而在三年之后，他断定自己对英国其实是毫无了解”^①。

鉴于这一困难，在编写本书时，我们很想参考一下国外学者是如何撰写有关其本国社会的研究著作。我们找了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所著《日本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译本）和美国社会学家罗宾·威廉斯的《美国社会》（纽约，1960年英文版）。这两本书对本国社会结构特征的描述各有独到之处，但是在写作方法上却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很难直接引为摹本。

我们将探求一种新的写作方法，这一方法也许该标称为“历史社会学”方法。所谓“社会学”是指，它注目于社会整体结构的考察，并将结构考察进一步转化为社会设制和社会行为的考察，这正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所谓“历史”，首先意味着考察对象所占有的极大时间跨度，由此决定了我们的



^① (英)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纽约，1919年，§ 9。

社会学研究必须具有一种历史性目光：不仅需要揭示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而且要展现其生成和演化的基本过程，进而从历史过程来深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

这一方法，曾被西方社会学家称之为“动态社会学”方法。然而，“历史社会学”与“动态社会学”相比，具有本质差别。后者往往不得历史真谛要领，因而只是从形式上描绘社会演变序列；“历史社会学”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作指导，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中去把握社会结构的形成和演变。

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的自我矛盾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表现出来，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动因又可进一步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与这一矛盾系列相应，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社会结构就是这些矛盾运动的综合产物。

所谓结构，就一般意义而言，是指事物之间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恒定关系（结合方式）。对于这些恒定关系，人们可以依据不同的理论原则和认识目的，从不同角度加以规定，以至作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之分别。在社会领域，表层结构主要体现为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深层结构则蕴含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内在依存关系中。如果说前者是社会的形式，那么后者便是社会的内容；或者说，前者是社会的符号，后者便是社会的意义所在。据此，要全面认识中国社会，就必须透过表层结构，把握其深层结构。

要全面研究中国社会，首先需要确认什么叫“社会”。马克思曾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般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

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① “**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②

马克思的论断包含这样几层意思：

- (1) 社会是一个具体的概念；
- (2) 社会是人们交往关系的体现，这种交往关系的本质是生产关系；
- (3) 社会的基本构成是与生产关系的特定形式相应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

从以上论断出发，我们可以把社会看作人类生活的有机组织形式，这一有机组织形式是与民族（社会化的人类集团）和国家（社会统制机构）的形成同时形成的。就人类生活整体而言，社会概念的内涵要大于民族和国家概念的内涵。这恰如马克思所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般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③

社会既然是人类生活的有机组织形式，那么必然具有一种统一的目标导向。从历史过程来看，人类社会的结构形式可以围绕军事活动、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等不同原则组建。社会结构的目标导向，决定了整个社会生活体系的基本构成。西方传

这一目标导向

① 马克思：《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77页。

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487页。

③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

统社会以军事政治原则为目标导向，它需要独立的领主经济和抽象的宗教观念作为支柱；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伦理政治为目标导向，从而需要相应的地主经济和宗法伦理观念作为支柱。这些不同的社会结构，实际上体现了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存环境的不同适应。

确定目标导向的性质，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本质及其演变具有莫大意义。据此，我们可以统观社会构成要素的基本特征，以指导对民族性格、经济结构、家庭生活方式、政治结构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具体考察。

在考察中，我们的视点主要集中于传统社会结构分析。这一考察重点的选定，并非全然由朴素的“寻根”偏爱所至，而是由现实的认识需要所决定。中华民族是一个深受历史影响的民族，传统的力量至今依然左右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当我们站在开创未来生活的历史新起点上时，只有返顾过去，才能更好地认清现实，以确定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断言：历史有一个轴心时代，在这一轴心时代中，人类奠定了其社会生活基础和精神生活基础，至今人类仍附着于这种基础上，她的一切创造活动都是为轴心时代所获得的精神所推动。这恰如一个人于幼年生活经历中形成的性格，将支配他一生的基本行为。诚然，雅斯贝斯的理论自有它的局限性，但是这一观点本身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人类历史是一个延续进化的过程，这种延续并不表现在具体历史事件的更替中，而是通过社会结构作用体现出来。发掘社会结构特征，正是为了揭示历史的延续本质。

以上选定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引导读者认识中国社会的方法。

(三)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社会形成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的存在。当人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脱胎于自然之时，便相应地投入创建社会的伟大活动中。人所处的原始生活环境，以及其采用的创造性活动的特质，决定了社会的最初性质，这一性质对以后历史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人就没有社会，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中华民族本身是一个多民族聚合体，诸多民族在长久的历史年代中，共同创建了中国社会，她们具有相似的生理习性和心理表征。从人种属性来讲，中华民族基本上归属于蒙古人种，与世界其他人种相比，她在肤色发型、牙齿器官、骨骼体态及血型气质方面具有综合性特点，通过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寻觅其原始生存条件和活动方式的一般特性。

如果说，人种特征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生理基础，那么，民族性格就构成了该民族的心理基础。所谓民族性格，亦被人称为“国民性”。有关中华民族“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在20世纪初，就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近年来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这反映了在社会变革之时，人们希望反观自我的意愿。

对于民族性格的探讨，可以从两个不同层次着手。首先，从哲学层次探讨，民族性格可以作为现实的人的本质来看待。马克思的名言：就现实性而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便成为从哲学上探讨民族性格的指南。其要旨在于：第一，揭示了民族性格的主要成因是社会生活，而不是生理本能；第二，强调民族性格的历史性，即一定的民族性格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活体系相对应。

其次，从心理学层次探讨，我们可以把民族性格视为决定民族基本行为的能量导向，这种能量导向又是通过人的需要系统体现出来。对此，马克思也有教导：人的本质即人的需要。从心理学上来看，人的需要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有机体系，人具有充分实现自己需要的本能，当满足需要的动机受挫而不能实现时，就会导致人的心理变态。人的各种需要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作为整体发生作用。当一种需要得到满足时，其他需要也会间接地得到满足；反之如果一种需要不得满足，其他需要便会因此受影响。

据此而推论，如果一种需要动机长期遭受压抑不能实现时，在这个需要系统中就会产生一种弥合功能，人的其他方面需要会因此而格外增强。这恰如一种“躯体的智慧”（坎农），当人的视觉丧失时，他的嗅觉、听觉和触觉都会变得格外灵敏。作为一种心理变态，当人的某一基本需要（如自由恋爱）遭受压抑时，便可能在这一方面形成虐待狂式的仇视心理；甚或，当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发展动机遭受挫损时，他们亦将在强化家庭生活的自足情绪中求得心理平衡。这些阻碍人的需要发展的原因，正是社会历史因素所致。因而，从人的需要和民族性格特征中，恰恰可以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生活本质。由此，心理学考察与哲学考察便达到了内在融合。

根据以上角度的考察，中华民族传统性格特征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重生意识浓厚；（2）崇尚乐感文化；（3）富于理性和中庸；（4）平均欲望强烈；（5）自卑与自大相通；（6）家庭观念极重。

考察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无论是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实质，还是对于当前改革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考察时，我们需要坚持科学的态度，从历史角度揭示民族性格中的

优劣之处，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夜郎自大。妄自菲薄会使我们失去可贵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夜郎自大则掩饰了我们自身的缺点，从而阻碍民族的自我改造。改造社会和改造人自身是统一的，没有民族的自我改造，中国的改革事业就会流于空谈。

社会结构是通过人的活动形成的，它实质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体系。人类活动可以分为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两大类。在物质活动中，经济活动是最基本的活动，因而经济结构便成为社会结构的基础。

对经济结构的考察，同样有表层和深层之分。表层结构主要体现在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货币体制的综合关系中；深层结构则通过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以及生产与消费的沟通方式反映出来，它是与生产活动的本质相联系的。中国社会的农业革命完成较早，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由于农业劳动过程的特点及铁制农具和畜力的广泛利用，家庭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单位，这便导致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自然结合，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以小农经济为主要形式。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既不同于狩猎经济或小手工业经济以个人为基础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也不同于实施刀耕火种粗放式农业经济或游牧经济以部落为基础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它兼有这两者的特点。

中国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曾指出，中国的小农经济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生产资料分散；二是小农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的结合非常紧密；三是货币经济的衰落与实物货币的兴盛。①

①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04—205页。